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风险社会 / (德) 贝克著; 吴英姿, 孙淑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5-04035-5

I. 世... II. ①贝... ②吴... ③孙... III. 社会学-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166 号

Copyright © Ulrich Beck 1999

First published in 1999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2-012 号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世界风险社会
原 著 者 [德] 乌尔里希·贝克
译 者 吴英姿 孙淑敏
审 校 董修权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03347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9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035-5 C·124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1
- 致谢 3

第一章 引论 :世界主义者宣言 1

第二章 世界风险社会等于世界主义社会？ 人为不确定性框架中的生态学问题 24

- 世界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素 25
- 现实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 29
- 世界公共领域和全球亚政治的出现 47

第三章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 :关于生存、 社会结构和生态学启蒙运动的问题 65

- 风险是永久的吗 65
- 风险微积分学 :在开放式未来前面的可预测的安全 67
- 风险与威胁 :在正常状态与意外情形的叠加方面 71
- 风险社会中技术与自然科学的角色 77
- 社会中的生态学矛盾 81
- 政治的反思性 :威胁的反作用力和社会运动影响的机会 86
- 生态学民主的乌托邦 90

第四章	风险社会与福利国家	96
	● 在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之间	96
	● 危险对远见 :作为内部危机的环境危机	102
	● 作为社会的自我批评理论的反思现代化	104
	● 线性技术的终结吗 ?	107
	● 关于进步的悲观主义的落伍	112
	● 摘要与前景	116
第五章	亚政治 :生态与制度权力的解体	120
	● 结论	140
第六章	知识还是无知 ? 关于 “反思现代化 ” 的两个视角	142
	● 出发点 :制度的反思 (吉登斯) ,反思性社区 (拉什) ,无法预测的结果 (贝克)	142
	● 无知的类型	157
	● 知识的线性和非线性理论	162
	● 无知、无法预测的结果和自我危害	164
	● 总结 :争议的方面	168
第七章	返观风险社会 :理论、政治、批评与研究计划	172
	● 风险社会理论的要素	174
	● 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风险定义的权力游戏	190
	● 展望 :风险的机会	194
参考文献		196
索引		209

致 谢

作者和出版商因为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资料而希望对下列机构表示感谢：

“引论：世界主义者宣言”的扩充和修改版，以英文的形式首次于 1998 年 3 月 20 日发表于《新政治家》。这次重印得到了拥有版权的《新政治家》的允许。

“世界风险社会等同于世界性社会吗？人为不确定性框架中的生态学问题”的修订版，首次以德文的形式发表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科勒周刊》的第 36 期专刊《环境社会学》上。乌尔里希·贝克拥有其版权。由乌尔里希·贝克翻译的英文版首次发表于《理论、文化和社会》【1996 年第 13 (4) 卷】，塞奇出版社拥有版权 (1996)。这次重印得到了编者和塞奇出版有限公司的许可。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生存、社会结构和生态启蒙问题”的修订版，首次于 1990 年以德文的形式由从事政治活动教育的联邦总局出版，乌尔里希·贝克拥有版权 (1990)。由马克·瑞特翻译的英文版首次发表于《理论、文化和社会》(1992 年第 9 卷)，塞奇出版社拥有版权 (1992)，这次重印

得到了其许可。

“风险社会与福利国家”的最初版本在弗朗西斯·埃瓦尔德的《国家预防》上以“风险社会和国家预防——中期结算的一个讨论”的题目用德文发表,版权由位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苏尔卡姆普出版社拥有(1993)。由马丁·卡尔莫斯翻译的英文版发表于S·拉什、B·瑟斯宗斯凯和B·温尼编辑的《风险、环境和现代性:朝向新的生态学》(塞奇出版社,1996)。这次重印得到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和塞奇出版有限公司的许可。

“亚政治:生态与制度力量的解体”的修订版,首次以英文的形式发表于《组织与环境》【1997年第10(1)卷】,塞奇出版社拥有版权(1997)。这次重印得到了其许可。

“知识还是无知?关于‘反思现代化’的两个视角”的修订与扩充版,首次以德文的形式由苏尔卡姆普出版社以“知道你不应知道”的题目发表于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所著的《反思现代化》,苏尔卡姆普出版社拥有版权(1996)。由马克·瑞特翻译的英文版,作为《死敌民主》的第7章,以“误解反思性:关于反思现代化的争论”的题目首次发表。鲍里特出版社拥有版权(1997)。

“返观风险社会:理论、政治、批评与研究计划”首次以英文的形式发表于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和约斯特·范·隆编辑的《给风险重新定位》,塞奇出版社拥有版权(1999)。这次重印得到了其许可。

第一章

引论：世界主义者宣言

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了挑战,并开辟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民选择了新的且意料不到的社会与政治形式。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的讨论已在试着理解这种变化并将其概念化。一些作者,无论他们使用的主要术语是“后现代性 (postmodernity)” [鲍曼 (Bauman), 利奥塔 (Lyotard), 哈维 (Harvey), 哈若威 (Haraway)], “晚发现代性 (late modernity)” [吉登斯 (Giddens)], “全球时代 (global age)” [阿尔布鲁 (Albrow)] 还是 “反思现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贝克 (Beck), 吉登斯, 拉什 (Lash)], 都是着重强调存在于新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中的人类计划的未决问题。另一些人重点研究了实验的同一性 [麦鲁希 (Melucci)] 和社会性 [马菲索里 (Maffesoli)] 的新形式, 个体化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陶瑞恩 (Touraine)], “后国家星座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哈贝马斯 (Habermas)] 或者 “世界民主 (cosmopolitan democracy)” 的先决条件 [海德 (Held)], 还有一些人在 “自然政治” 方面撰写了大量的著作 [瓦达那·

希瓦 (Vandana Shiva) 盖诺特·伯墨 (Gernot Böhme) 马哈汀·哈耶 (Maarten Hajer) 约翰·S·德吕茨克 (John S. Dryzek), 蒂·哈瓦德 (Tim Hayward), 安德鲁·德布森 (Andrew Dobson), 芭芭拉·亚当 (Barbara Adam), 罗宾·格鲁怀特 (Robin Grove-White) 和布莱恩·温尼 (Brian Wynne) 〕形成共识的是: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将面对深刻的矛盾和引起混乱的似非而是的隽语,将体验“柳暗花明”式的希望。

- 我试图将这些变化加以概括和系统化。为此,我已经就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区别研究了一段时间。我用“第一现代性”来描述以民族—国家社会为基础的现代性,其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主要是从地域意义上理解的。集体的生活方式、进步和控制能力、充分就业和对自然的开发这些典型的
- 2 第一现代性的东西,如今已经被全球化、个体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和全球风险(如生态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崩溃)等五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暗中破坏了。对于第二现代性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真正的挑战是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必须同时对所有这些挑战作出反应。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思考这五个过程,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存在的共性:即它们都是第一现代性的、简单的、线性的、基于民族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的成就的无法预测的结果〔这是从迪尔凯姆 (Durkheim) 韦伯 (Weber) 和马克思 (Marx) 到帕森斯 (Parsons) 和卢曼 (Lumann) 的古典社会学讨论的焦点〕。这正是我在论及“反思现代化”时所指的意思。激进的现代化常常以一种既非人们愿意,亦非人们预期的方式,暗中削弱着第一现代性的根基,并改变着它的参照标准。或者,用系统论的术语说,功能差异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再也不能被进一步的功能差异所控制。实际上,在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一种

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有所区别的新的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新的全球秩序，新的社会和新的个人生活正在形成。因此，从社会学和政治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一个词汇变化表，一个新的参照标准。这不是“后现代性”，而是一种第二现代性。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修正社会学，以便它能为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创造提供一个新的框架。关于反思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非仅仅解决西方模型的衰落问题，关键问题是这种模型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不同的现代性之间有何联系。哪些新的预料不到的社会形式正在出现？何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以及何种矛盾冲突正在地平线上出现？

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强调二者的共同性——而不是差异——已成为纠正困扰当代许多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的偏见的一个重要步骤。这种偏见把当代非西方社会贬黜为“传统的”或者“前现代化的”范畴，因而不是以其本身的术语来定义它，而是把它们定义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或者认为它们缺少现代性。（许多人甚至相信，对前现代化前的西方社会的研究能帮助我们了解今天非西方社会的特征！）坚定地把非西方世界定位于第二现代性而不是定位于传统的范畴，将实现现代性的多元化，因为它为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性的多维（divergent trajectories）概念化打开了空间。这个多元现代性的观点令人想起尼赫鲁（Nehru）“现代性装束”的形象，这个形象在穿着方面运用了不同的灵巧方式。^[1]

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话语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

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验。

与马克思的判断相反,我们可以用萨里尼·兰德里亚(Shalini Randeria)的话说,今天“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向欧洲展示了它对自身未来的想象。站在肯定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它的特征列为多宗教、多种族和多文化社会的发展,跨文化模式及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和在许多层面上变得明显的法律多元主义,以及主权国家的增多。站在否定的一面,我们能够指出非正式部门的扩张和劳动的弹性化,法律对大范围的经济和工作关系的失调,由政府造成的合法性的丧失,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增加,多国集团更有力的干涉和每日的高暴力与犯罪率。所有这些方面连同相关问题及其争论都暗示,如果想理解第二现代性的动力和矛盾,我们对于置身其中的世界风险社会(包括非西方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参照标准(参见《韩国社会学杂志》,1998)。

随着两极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但“风险”指的是什么?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当然,每个社会都经历过危险,但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它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它与管理和技术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内在关联。风险以决策为先决条件。这些决策曾经靠那些将手段和目标,或者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固定的可计算的标准提纲。而这些标准正是被“世界风险社会”归于无效的东西。所有这些与可能称得上可计算和可选择的安全的最大象征——个人保险——一起变得非常明显。所谓可计算和可选择的安全既不包括核灾难,也不包括气候变迁及其后果,亦不包括亚洲经济崩溃,不包括低概率但高效果的未来技术各种形式的风险。事实上,大多数

引起争论的技术 ,比如遗传工程 ,是没有个人保险的。

是什么导致风险的这种新特征？风险和风险社会的概念把曾经是相互排斥的东西 ,比如社会和自然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风险的松散结构和威胁的实在性等等结合在一起。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曾说过 :不存在社会这样的东西。但大多数社会学家信奉被称为“反撒切尔主义”的说法 ,即除了社会别无他物。这种“除了社会别无他物”的社会学没有看到第二现代性的生态和技术的挑战。风险社会理论打破了这种自我满足和自我中心论。它主张 :有争议的风险定义的非实质性 ,与世界范围内被专家和工业制造出来的风险的实质性是同时存在的。这包含着多重涵义。例如 ,风险分析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手段 ,对被建构和质疑的风险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风险科学是盲目的 ;不了解威胁的由技术制造的“第二性”的风险科学是天真的。诸如此类的风险本体论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知识享有特权。它迫使每个人把不同的且常常是背道而驰的合理性主张结合起来 ,面对“矛盾确定性”采取行动和作出反应 [施瓦茨 (Schwarz) 和汤普森 (Thompson) ,1990]。

在世界风险社会中 ,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 ,常常取代如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相联系的不平等之类的变量。它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 (power game) 和它的元标准 (meta-norm) :谁 ,以及在一个人为不确定的时代基于什么来定义一种产品、一种技术的风险？在 1998 年 ,当绿党 (Greens) 进入德国的施罗德 (Gerhard Schröder) 政府时 ,他们开始采取行动改变某些与风险定义相关的权力关系 ,例如 ,通过专家兼职策略 ,召集过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见的专家进入政府安全委员会 ;或者通过提高可接受的保险的水平 ;或者通过强化至今未被真正

重视的法律标准等等。这在普通的体制中也许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风险社会中,表面上看似似乎并不重要的政治干涉和行动领域,正变得举足轻重,表面上“次要的”变化确实在风险政治的权力博弈中引发了基本而又长期的变化。

- 因此,风险社会的组织结构再次把本来有严格分界线的领域,如自然问题、民主的民主化及国家未来的角色等等联系起来。贯穿最近 20 年的很多政治争论已集中在政府权力和合法性的衰落,以及民主文化更新的需要等问题上。风险社会不仅要求国家,而且要求私有公司和各门科学开放其决策过程。它呼吁对“定义关系 (relations of definition)”,即风险冲突隐含的权力结构进行制度上的改革。这将促进环境的革新,并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好的发达的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在这个公共领域中,人们可以讨论和判断支撑风险冲突价值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参见雅格布斯 (Jacobs),1997]。

但与此同时,风险的新特征一方面连接着个体自主、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安全和性别关系,另一方面也连接着科学与技术变化的所向披靡的影响。世界风险社会使公众话语和社会科学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同时又是局部的和个人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这个“全球的时代”里,风险的主题通过世界主义民主问题把下列许多本来不相干的、新的跨国政治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了。这些问题包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 (疯牛病) 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

当然,风险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在全球是平均分布

的。恰恰相反,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在最近的10年间,贫困到处在加剧。联合国称,目前超过24亿的人口正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环境下,较前一个10年有显著增加;12亿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差不多数量的人口没有足够的居住、健康和教育服务;超过15亿的人口正营养不良。这并不是因为没有食品,或者存在太多的匮乏,而是因为不断加剧的对贫困的忽视和排斥。

不仅贫富差距已经拉大,而且更多的人正在陷入贫困。由西方强加给负债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强迫这些国家发展专项产业满足富国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保护、教育和关心最弱者,致使情况恶化。目前最穷的国家在向最富的国家还债方面所花的钱,比他们用于自己国家的健康和教育上的钱还要多。

正如所有的世界和国家论坛已经发出的警告那样,过去10年已经表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得到强行推行的教条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环境风险和问题恶化的程度,一点儿不亚于莫斯科的中央计划经济。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已经增加了人类的不幸。如今在重要的自由贸易条约,如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背后,在最富的国家中,消费几乎失去控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最富的国家的消费已经增加了6倍。占人口20%的最富有者正在消费比他们的父辈大约多6倍以上的食物、能源、水、运输、石油和矿产。

风险和责任是有内在关联的,风险和信任,还有风险与安全(保险和安全)也是如此。谁应当承担这种责任(及因此而产生的代价)呢?抑或我们生活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背景下?这是在我们的时代里绝大多数政治矛盾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风险导致控制,因此风险越大,对控制的需要就

越强烈。但是,“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把注意力引向对风险——我们为自己制造的风险——的有限控制的能力上。主要的问题是,在人为的不确定的状况下如何做出决定。这种人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且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并对这种新的全球市场风险采取行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风险被亚洲危机所强化,并证明了经济世界风险社会的社会和政治动力。全球市场(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一种新形式,因为它是一种极端非个人化的制度形式,以至于即便是对自己也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在信息革命的帮助下,全球市场风险能够允许近乎瞬间的资金流动来决定谁(如果有的话)将成功,谁将遭受损失。正如经济理论中的竞争术语所说的,没有哪一个组成部分大到足以改变全部的流通;没有人能控制全球市场风险。每个组成部分服从自身的利益。而结果与理论预测的一致。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政府,因此,全球市场风险不可能像国内市场那样被规制,也不可能有任何国内市场企图抵制它而不受惩罚。但与此同时,结构宿命论(the constructed fatalism)也是一种幻像。最近,聚光灯已经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为它试图把亚洲国家推入古典经济学的普洛卡斯汀(Procustean)模式。

这种新的自由全球经济政策的一个麻烦是:国际经济政策制定者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世界正逐渐变得更为民主。投票人对损害他们的政策有投反对票的倾向;他们常常目光太短浅,以至于等不及经济学家保证的改良——那种在他们的生命都已耗尽时,才在凯恩斯主义(Keynesian)长跑中姗姗来迟的改良。此刻,所谓“亚洲危机”已经把亚洲的中产阶级置于飘浮的境地。破产和失业的浪潮正猛烈冲击着这个地区。

西方投资者和时事评论家常常评价这场危机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多大的威胁之类。但是，正如全球生态风险一样，全球金融风险不可能“保持站在一边”，而是泛滥开来并把自己变为社会和政治风险，即对中产阶级、穷人或政治精英的风险。非常简单的例子是，在亚洲，这场危机正在摧毁如此多的生活，以至于其焦点已经从纯粹的经济参照系转变为可能有人称之为“阶级跳水（class plunge）”的东西方面上来。这再一次使得政府和国家，以及少数派团体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等发生动摇。

政治分析家称，现在要准确地预测这种新的社会和政治风险在个别国家将如何泛滥仍是很困难的。但是如今很多人认为，反对西方的反作用力风险、内在的危机乃至两国之间的冲突，已经呈跨地域增长态势。而且在大约一年以前还不能想象的事情现在正在变为现实：全球自由市场正在分裂，全球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正在崩溃。在全世界，政治家们，包括欧洲的领导人，正迈着试探性的脚步走向一种新的政策：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有的人正在寻求新的跨国机构来控制全球金融流量，而另一些人则呼吁一种跨国保险制度，或者一种现存的跨国机构和社会制度的新政治。其结果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时代成为正在消退的记忆，且正在被它的对立面——全球市场经济的政治化——所取代。

如同你可以用1986年切尔诺贝利在人类学上的打击为例，说明全球技术和生态风险社会的基本方面一样，今天，你可以用亚洲危机的经历说明全球市场风险的组成要素。据此，在全球金融和全球生态风险社会里：

- 两个矛盾、两种分配逻辑是内在联系的：好运的分配和厄运的分配；
- “风险计算”的基础被暗中破坏了：例如，像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穷人不能得到财政补偿这样的损害，使个人在保

证自身抵抗全球经济衰退方面变得毫无意义。

- 全球金融风险的“社会爆炸”正成为现实：它引发了一种暗中削弱科层制、向传统经济的统治地位和新自由主义挑战、并重新划定当代政治的边界和战场的文化和政治变化的动力；

- 国家—政府制度的崩溃；

- 风险总是牵涉到责任问题，因此，“责任全球化”需要成为一个全世界公共的和政治的问题；

- 新的选择权正在出现：国家或地区的保护主义、跨国机构和民主化。

以下是我把自己称为既非乐观主义者亦非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的原因：世界风险社会是一种“后现代星座（postmodern constellation）”的对立面；在一种新的意义下，它是一个自我批评的、高度政治的社会：政治和民主的——或许甚至是社会学的——跨国对话必须重新发明。

然而，本书的焦点相对而言是较为有限的。它既不包括不确定和风险的全球政治经济，也不包括风险的历史，也不包括冷战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相反，本书视点主要集中在风险的生态和技术上的问题，及其社会学和政治上的启示。围绕这个主题，本书将讨论并回答我前一本书《风险社会》引发的部分基本批评。^[2]本书的论题是，我们现在拥有了一个在若干年前尚未有过的“地球政治”，并且它可以被置于世界风险社会的动力和冲突的说法中来理解和组织。什么是环境？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什么是人类中的“人”？这些及类似问题必须在跨国环境中被记住、重置、重新考虑和重新讨论，即使无人得出答案。

*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和比我们想象的

更道德的风险时代中。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强劲的潮流。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渴望成为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

虽然这种“自我本位”的时代已经受到不少批评,但我相信它的个人主义在一种新的意义下是道德的和政治上的。从许多方面看,这都是一个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有道德的时代。对于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比如从我们对环境和动物,到对性别、种族和世界范围的人权的态度,自由的孩子感受到的比人们过去所做的更热情,更有道德。

可能正是这一点,通过把全球性置于政治想象力、行动和组织的中心,为一种新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但任何想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凝聚力的尝试,都必须从承认个体化、多样性和怀疑论已被写入我们的文化这一点入手。 9

让我们来厘清“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含义。它不是指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不是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意思。个性化是指如何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个体化亦非撒切尔主义、市场个人主义或者原子化。相反,个体化是一个结构的观念,它与福利国家有关;它指的是“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例如,福利国家大多数权利和享受权利的资格都是为个人而不是为家庭设计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以雇佣为先决条件。雇佣反过来暗示着教育,且两者都被预先假定为易变的。在这些要求下,人们被请求把自己组构成个体,把自己计划、理解和设计为个体。并且,如果他们失败,也只能归咎于自己。于是,自相矛盾地,个体化暗示着一种集体生活方式。

当这个概念与道德全球化话语相结合时,我相信,世界民主如果是乌托邦的话,也是一种现实的计划——尽管在一个

副作用时代 (an age of side-effects) 里, 我们也必须考虑黑暗面, 考虑这种民主会在政治上被利用, 作为旧式帝国冒险的前沿阵地等方面的问题。

我们是一个“自我本位”的社会吗? 有人可能会从这句主导大众舆论的口号中认同这一点: 团结的解散, 价值的贬损, 自爱欲文化, 权利取向的享乐主义, 等等。站在这个立场, 现代社会抛弃了它不能更新的道德源泉; 先验的“价值生态学 (value ecology)”这个社区、团结、正义和多元民主从中得以“生根”的土壤正在衰落; 现代性正在暗中削弱它自己的绝对必要的道德前提。

10 但是, 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概念是错误的。道德, 包括基督教的道德, 与政治自由不是互相排斥, 而是互相包容的, 即便这意味着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被注入基督教的传统之中。

问题在于: 什么是现代性? 答案是: 它不仅是资本主义 (马克思)、合理化 (韦伯)、功能差异 (帕森斯和卢曼), 还包括政治自由, 市民身份以及市民社会的动力。答案的关键在于,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 道德和正义并非享有治外法权的变量。恰恰相反, 在现代性的内核中有一个独立 (既古远又非常现代的) 意义的源泉, 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泉不会因为天天使用而枯竭——事实上, 使用的结果是更有生机的喷涌。就这个观点而言, 现代性是指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确定的世界正在毁灭, 并正在被一种经合法批准的个人主义全盘替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

在我们称之为第一现代性的东西中, 谁有自由权和谁无自由权的问题, 是通过求助于性别和种族的“本性 (nature)”之类的事情得到答案的; 在普遍要求与特殊现实之间的矛盾, 是通过一种差别本体论来解决的。因此, 直到 20 世纪 70 年